

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

程 浩

内容摘要: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边父,从人物行迹与名字关系来看,或即庄公时期的重臣公子吕。《郑文公问太伯》中的太伯,行辈为文公叔伯、身份为小宗宗主,比照史料对郑国前期公族的记载,其人为公子吕之孙、公孙阙之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公孙阙、太伯以及同篇的堵之俞弥一脉,皆因公孙阙之字“子堵”而为郑国堵氏。《良臣》、《子产》中的周之遗老与子产师辅,也大都见于文献。“桑丘仲文”或为“乘丘仲文”之讹,乃是以鲁地乘丘为氏。“杜逝”即“杜泄”,曾为鲁叔孙氏之宰。“子刺”虽未见于经传,但从近出的青铜器铭文来看,其为郑庄公之裔孙,同时也是郑国列氏的先祖。

关键词:清华简 郑国 边父 太伯 子产师辅

清华简的《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和《子产》、《良臣》^①等篇,与郑国历史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这几篇简文在叙事过程中对郑国历代君臣多有提及,其中赫赫有名如武姜、子产者,皆昭然可考,自不待言。但也有一些新见的人物名号为传世文献缺载,无疑为这些史料的运用增添了许多障碍。今择其要者略作考证,并向方家请教。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书’类文献先秦流传研究”(16CZS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良臣》篇虽通列历代名臣,但以郑国最为详尽,其作者的师传很有可能与郑国有关。李守奎先生论述清华楚简中的外来成分,即以《良臣》为例,云:“全篇罗列自黄帝至鲁哀公期间各朝名师良臣,其中对郑国记载独详,尤其是子产,还详记其师,有些文献缺载。”(李守奎:《楚文献中的教育与清华简〈系年〉性质初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00页。)李学勤先生在介绍此篇时,也曾说:“猜想简文的作者有可能源出郑国,甚至和子产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第71页。)

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边父

《郑武夫人规孺子》篇的主要内容是郑武公去世后其夫人武姜对新君庄公的诰辞。简文记载,武姜命令庄公三年不可执国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群大夫的恐慌,此时大臣边父出面规诫群臣慎重其事,稳定住了新君即位后的政治局面。之后在武公小祥之期,群大夫又推举边父对庄公进行劝进,虽然庄公最终没有采纳边父的谏言亲理国政,但从此事中也足以窥见边父其人在当时有着群臣领袖的地位。

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由于传世史料中没有明确的对应,整理报告以及后来的研究者都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不得不说是本篇的一大缺憾^①。结合人物行迹与政治地位等因素来看,我们大胆猜测简文中的这位边父,就是文献所载庄公时期的重臣公子吕。

公子吕,一字子封,为郑桓公之子,武公之弟,庄公之叔父。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说解其名字关系云:

吕之言甫也。《尔雅》曰:“甫,大也。”《淮南子·天文篇》:“仲吕者,中充大也;南吕者,任包大也。”《方言》:“吕,长也,宋鲁曰吕。”长亦大也。

《商颂·殷武篇》“封建厥福”,毛传曰:“封,大也。”^②

王氏以“吕”与“封”皆可训“大”释之,遭到俞樾的反对,后者在《春秋名字解诂补义》中说:

春秋之世,若晋侯周、卫侯郑、陈侯吴、卫侯晋之类以他国为名者甚众。

吕乃姜姓之国,《郑语》所谓“南有荆蛮申吕”是也,是时已为楚县矣。公子

吕盖取古国名为名,故字子封。《楚语》韦注曰:“封,国也。”^③

俞樾的这种说法虽然较之王引之有一定的进步,但也不一定靠得住。因为如果公子吕是以吕国为名的话,似乎当如郑国公孙楚、卫国公子郢一般字“子南”才是。

在我们看来,公子吕之名“吕”或是“闾”字之省。“闾”从“吕”得声,二字通假不存在障碍。“闾”字本义为里巷之门,但也经常被引申用作聚落单位。《周礼》云:“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④“闾”字又可通“里”,《吕氏

①子居先生曾将本篇简序进行重新编联,并根据上下文推测边父名“御寇”(子居:《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解析》,中国先秦史网,2016年6月7日)。

②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贾贵荣、宋志英辑:《春秋战国史研究文献丛刊》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0-11页。

③俞樾:《春秋名字解诂补义》,贾贵荣、宋志英辑:《春秋战国史研究文献丛刊》第2册,第170页。

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07页。

春秋·期贤》有“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之”，高诱即注“间”为“里”^①。正是由于“间”有作为人口与土地单位的用法，使之可与子封的“封”字对应。《说文》云：“封，爵诸侯之土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②“封”字有启拓封疆之意，《左传》僖公三十年有“既东封郑”^③，即是此训。另外一则显豁的证据是，楚国的公子启其字即为“子间”，可见“间”、“启”、“封”作为名字时的关系。

明晰了公子吕为何字“子封”之后，我们再来看“边父”这个名号。大家都知道，先秦时期对同一个人往往会有多种称法，如晋人士会又可称随会、范会、士季、随季等。春秋时人称字，除了“子+某”的称法，还可称为“某+父”，如鲁公子翬字“羽父”，公子益师字“众父”，皆是此例。与此同时，一人兼有二字，在春秋时期也不乏其例，如郑灵公字“子蛮”又字“伯貉”，郑国公孙侨字“子产”又字“子美”，楚国斗椒字“子越”又字“伯棼”。公子吕除了字“子封”外，当然也可以另有“边父”这样的字。“封”有边界、疆域的意思，《左传》襄公三十年“田有封洫”，郑玄注云：“封，疆也。”^④而“边”字的本意就是边疆，《国语·吴语》“顿颡于边”，韦昭注：“边，边境也。”^⑤因此，“边父”的称法完全有可能与“子封”一样，是公子吕的字。

把边父视作公子吕，从身份上来看也是比较合适的。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公子吕是庄公叔父，因而他在武公去世后有着襄助新君之责任。而他之所以在简文中能够成为群臣领袖，恐怕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先君之弟的身份。

如果将传世文献中公子吕的行迹与简文的边父进行比照，也可寻得许多相似之处。根据简文记载，在庄公刚即位之时，边父对他进行了一番规诫：

二三老臣使御寇也布图于君。昔吾先君使二三臣，抑早前后之以言，使群臣得执焉，且毋交于死。今君定，拱而不言，二三臣事于邦，惶惶焉，焉削错器于选藏之中，毋措手止，殆于为败。姑宁君，是有臣而为褻嬖，岂既臣之获罪，又辱吾先君，曰是其蓐臣也。^⑥

①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78页。

②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87页。

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31页。

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13页。

⑤徐元浩：《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538页。

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西书局，2016年，第104-105页。释文采宽式，编联参考了上揭子居先生文，贾连翔则对做此编连的原因有详细的分析（贾连翔：《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篇的再编连与复原》，《文献》2018年第3期，第54-59页）。

在这段话里,边父既有对新君早日执政的劝告,也隐约表达了对武姜乱郑国之政的担忧。

此后,共叔段在武姜的支持下发展势力,与郑有“耦国”之势。《左传》隐公元年载公子吕语于庄公曰:

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①

公子吕劝庄公早日除掉图谋不轨的叔段,否则“国不堪贰”,后患无穷。虽然公子吕的这次进谏没有得到采纳,但是之后叔段兴兵起祸,庄公正是“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②。在武姜有乱政之谋时率领群臣坚决反对,待叔段起师作乱时又担当主将亲自讨伐,边父在对待武姜叔段集团的态度方面,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二、《郑文公问太伯》中的太伯与郑国堵氏

清华简中另外一篇专述郑国史事的文献《郑文公问太伯》,内容是郑国大夫太伯临终前与文公的问对。简文开篇就讲:“子人成子既死,太伯当邑。”^③这里的子人成子,整理报告已经指出应即文公的叔父子人语。但是对于太伯其人,诸家却没有给出很好的说法,尚需仔细探究。

简文对于太伯身份的记载,最重要就是发首的“子人成子既死,太伯当邑”这句话。所谓“当邑”,一种理解即《左传》习见的“当国”。负责整理此篇的马楠先生就说:“‘当邑’与‘当国’文意相类,谓太伯继子人成子执政。”^④按照这种说法,太伯生前应担任着郑国的执政卿,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是对于“当邑”二字,李学勤先生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在《有关春秋史事的清华简五种综述》一文中指出:

“当邑”应该是治理封邑的意思,所以太伯很可能是子人成子的长子,也就是文公的兄弟行。^⑤

李先生将“当邑”者视作封邑的宗主,既然太伯继子人成子“当邑”,那他也就只能是子人成子的长子了。

但是把太伯视作子人语的儿子,与文公同辈,却与简文的其他线索有着明显的矛盾。在简文中,文公屡言“不穀幼弱”,自己“譬若鸡雏”,并尊称太伯为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16页。

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16页。

③《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第119页。

④马楠:《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与郑国早期史事》,《文物》2016年第3期,第85页。

⑤李学勤:《有关春秋史事的清华简五种综述》,《文物》2016年第3期,第80页。

“伯父”。这其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阻碍着李先生说法的可信性:首先是文公为厉公长子,厉公为子人语之兄,如若太伯为子人语之子,即便有可能比文公年长,但也不至于会比自己伯父的长子大太多。简文中的太伯已垂垂老矣,此时的文公又怎能自称“幼弱”、“鸡雏”呢?

再者是,如果太伯为文公之从兄弟,文公不当称其为“伯父”。对于这一问题,李学勤先生认为“伯父”是对年长大夫的特定称谓,而并不表示血缘上的亲属关系^①。不可否认,文献中确有天子称诸侯为叔伯的记载,如《仪礼·觐礼》云:“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②但是尊称诸侯为父、舅是天子之礼,而将之化用为诸侯称大夫,则只是后人的说法。如《诗·伐木》毛传云:“天子谓同姓诸侯,诸侯谓同姓大夫皆曰父,异姓则称舅。”^③服虔注《左传》云:“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④皆是传言而非经说。历代经师欲言诸侯可称同姓大夫为叔伯,往往以郑厉公称原繁“伯父”与鲁隐公称僖伯“叔父”为证。但是臧僖伯为鲁孝公子、鲁僖公弟,本就是鲁隐公的亲叔父。至于原繁,《史记·郑世家》载厉公“入而让其伯父原”^⑤,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就曾据此认为:“盖原繁于昭穆正为厉公之伯父,非泛称也。”^⑥由此可见,在诸侯对大夫的称谓中,“伯父”“叔父”表示的仍应该是亲属关系,而非天子之于诸侯的自谦。实际上,即便只是因情推说,也可知文公不太可能称从兄弟为“伯父”。对于春秋时期的天子来说,由于诸侯大多分封较早,血缘关系已经疏远,称叔父、叔舅问题不大。但是诸侯国的大夫往往分宗未久,与公室血缘关系较近,于“兄弟”称“叔伯”岂不是乱了宗法?因此,简文中的太伯当非子人成子之子、文公的从兄弟,还应是文公的叔伯辈贵族。

在明晰了太伯的行辈后,我们再来试着分析一下“太伯”这个名号。在西周春秋时期称“伯”的一般都是世家大族的嫡长子^⑦，“伯”字既是长幼排行,又彰显着宗子地位。至于称“太”,大概是一种美称。“太”与“泰”、“大”等通,文献中经常有此类称谓,比较著名的如周太王的长子称“太伯”,楚令尹成大心号

①李学勤:《有关春秋史事的清华简五种综述》,《文物》2016年第3期,第80页。

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092页。

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1页。

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28页。

⑤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二《郑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764页。

⑥章太炎:《春秋左传读》,《章太炎全集》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5页。

⑦详参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62-78页。

“大孙伯”。《左传》隐公元年载叔段封京，“谓之京城大叔”，杜注云：“谓之‘京城大叔’，言宠异于众臣。”^①庄公十九年载鬻拳自刎，“楚人以为大閼，谓之大伯”，孔疏云：“谓之大伯，伯，长也，为门官之长也。”^②可见在名号前加“大”或“太”，只是为了体现尊隆，并没有实际意义。从“太伯”这个称号，我们只能得出其人为小宗宗主的结论，而对他的名、字、氏等则无从知晓。

按照一般的认识，以太伯的身份之尊贵、地位之崇高，《左传》等史料不应会缺载。比照他文公叔伯的辈分、小宗宗主的身份以及郑国执政卿的官职，总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而且郑国立国较晚，到文公初年宗室的分支还不算多，故有条件运用排除法进行推求。

文公的叔伯中，血缘关系最近的当然是厉公的亲兄弟，也就是庄公诸子。庄公在位43年，生了至少12个儿子^③。这其中可以称“伯”的只有庄公的长子昭公忽，但其人已在昭厉之乱中被高渠弥所杀，自然不可能复为文公的执政卿。简文公布后，王宁先生曾认为“太伯”即春秋早期活跃在郑国政坛的“泄驾”，并猜测泄驾本为庄公之子、文公之叔^④。但是根据《左传》隐公五年的记载，泄驾早在庄公初年就与祭仲、原繁一起统率三军，他的行辈更有可能与原繁一样，为厉公的叔伯、文公的祖辈。而且以泄驾的资历，他做执政卿也应该在子人语之前，而不会待其死后才继之当国。更何况，即便泄驾为庄公之子、厉公的兄弟，身为庶子的他也是不能称“太伯”的。

既然“太伯”并非庄公之子，那他有没有可能是武公之孙呢？传世史料记载武公的儿子只有庄公与共叔段。《左传》隐公元年载共叔之乱后，公孙滑随父出奔卫，其人极有可能是共叔段长子。公孙滑身份为小宗之长，辈分为文公叔伯，符合简文中“太伯”的特征。但是自鲁隐公元年公孙滑出奔，至鲁庄公二十二年文公即位，均未载他曾回归郑国。《左传》庄公十六年云郑厉公复位后清算政敌，“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⑤。可见在厉公之时，身居郑国的共叔段后人就只有公父定叔。公孙滑此时或仍出奔在卫，或已客死异国，总之不存在与文公问对的可能。

除了武公、庄公之昭穆，郑国公族中居于文公叔伯辈的还有桓公的曾孙。前述的公子吕，为桓公之庶子，他的儿子即与庄公同辈，孙子则为文公之叔伯。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16页。

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3页。

③《左传》鲁庄公十四年载厉公复位时“庄公之子犹有八人”，再加上已经死难的昭公、子亶、子仪以及在位的厉公，则至少有十二人。

④王宁：《清华简六〈郑文公问太伯〉之“太伯”为“泄伯”说》，简帛网，2016年5月8日。

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2页。

《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郑庄公入许,出战的有两位“公孙”,一位是与颍考叔争车的“公孙阙”,另一位则是后来驻守许国西偏的“公孙获”。作为桓公之孙,此二人一般被认为就是公子吕的儿子。身为庄公的再从兄弟,他们各自的长子都是可以被文公称作“伯父”的。

这其中的“公孙阙”,在文献中并非昙花一现。除了鲁隐公十一年随庄公入许的“公孙阙”,《左传》庄公十六年还载有一位“公子阙”。杜预注云:“隐十一年,郑有公孙阙,距此三十五年,不容复有公子阙。若非‘阙’字误,则‘子’当为‘孙’。”^①如果这里的“公子阙”就是桓公之孙“公孙阙”,那么此人在郑国政坛着实活跃了很长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左传》记载,公孙阙的字为“子都”。对于其名字关系,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分析说:

《说文》:“阙,遮拥也。”《夏书·禹贡》“荣波既猪”,《史记·夏本纪》作“荣波既都”。《礼记》郑注:“猪,都也。”^②

“阙”既为“堵塞”之意,与通“堵”的“都”自然是同义互训的关系。更有一种可能,所谓“子都”,本就是“子堵”之讹。也就是说,桓公的这位孙子公孙阙其字原为“子堵”。

若此说可以成立,则公孙阙其人便可以与简文有很好地呼应。《郑文公问太伯》之末提到了文公时郑国的几位良佐,其文云:

君如由彼孔叔、佚之夷、师之佖鹿、堵之俞弥,是四人者,方谏吾君于外,兹詹父内谏于中。^③

这其中的“孔叔”,《左传》僖公三年载:“楚人伐郑,郑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齐方勤我,弃德,不祥。’”^④“佚之夷”,整理者已经指出与《左传》僖公三十年所载举荐烛之武退秦师的“佚之狐”有关。至于“师之佖鹿”、“堵之俞弥”以及“詹父”,应该就是《左传》僖公七年管仲所称“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⑤的“三良”。其中的“堵叔”,即“堵之俞弥”,又名“堵寇”,其事屡见《左传》。鲁僖公二十年云“夏,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⑥,鲁僖公二十四年又有“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⑦。过去由于没有见过“堵之俞弥”的叫法,诸家都将此处断读为“公子士”与“泄堵寇”、“泄堵俞弥”,误后者为“泄堵”氏,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2页。

②转引自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56页。

③《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第112页。

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92页。

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99页。

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11页。

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17页。

认为其是泄驾的后人。马楠先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并指出:“疑‘士’、‘泄’一名一字,或名‘士泄’而单称‘士’。”^①既然“泄”字应从上读,那“堵寇”、“堵俞弥”就应该是“堵”氏。堵氏除了堵俞弥,后来在郑简公时又有堵女父、堵狗,在郑国繁衍发展了很长时间。

这里之所以要用一定的篇幅来论述简文“堵之俞弥”为“堵”氏,是为了将其与公孙阙——也就是“子堵”联系起来。春秋时人多以祖字为氏。如果把“堵之俞弥”视作“子堵”之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堵氏”的来源了。有了这样的前提,再结合上文对郑国前期公族的梳理,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推论:简文中的太伯即为公孙阙的长子,是后来堵氏的宗主,而他临终前向文公举荐的堵之俞弥,正是其子。如此一来,文公称其为“伯父”就合情合理了。而太伯的政治影响力,以及这次问对中的“内举不避子”,也帮助堵之俞弥延续了堵氏自公孙阙以来的参政传统,成为文公时代的重要朝臣。

根据以上论述,兹将郑国边父、太伯一脉的世系列示如下(加粗的人名均见于简文):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国君世系	郑桓公	郑武公	郑庄公	郑厉公	郑文公
堵氏世系		公子吕(边父)	公孙阙(子堵)	太伯	堵俞弥

三、《良臣》、《子产》中的周之遗老与子产师、辅

清华简《良臣》罗列了上古以至春秋列国列朝的股肱之臣,其中涉及郑国的部分尤为详尽,其于郑桓公云:

郑桓公与周之遗老史伯、宦仲、虢叔、杜伯后出邦。^②

这其中的“史伯”,曾为周宣王太史,在西周末年与桓公谋划郑国东迁,其问对见于《国语·郑语》。“杜伯”亦是周宣王时臣,《国语·周语上》载“杜伯射王于郕”^③,与周王室的恶劣关系或许便是杜氏随桓公逃离宗周的原因。春秋时期晋国有杜氏,《左传》文公六年载晋文公夫人杜祁,杜注云:“杜祁,杜伯之后祁姓也。”^④可见杜伯的后人在晋国也有分支。

①马楠:《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与郑国早期史事》,《文物》2016年第3期,第85页。

②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第157页。

③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38页。

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44页。

“虢叔”，整理者疑其为《国语·周语上》中的宣王卿士虢文公。实际上，郑桓公东迁立郑的过程中曾灭虢、郛^①，在史伯的谋划里，还提到了“虢叔恃势，郛仲恃险”^②。《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语：“制，岩邑也，虢叔死焉。”^③综合来看，史伯与庄公口中的这位虢叔与郑国的关系更为密切，《良臣》里的“虢叔”更可能是他而非虢文公。

“宦仲”，文献未载，整理者也没有给出意见。周飞先生曾根据《诗经》与金文的记载，指出其即宣王时期的重臣南仲^④。但是以南仲在周王朝的显赫地位，似乎不至于随桓公“逃死”，而且“宦仲”与“南仲”在用字上也很难进行对应。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一件“仲宦父鼎”（《集成》02442），时代在西周晚期，其器主“仲宦父”，或许与简文的“宦仲”有关。

随桓公东迁的“周之遗老”，应该还不止《良臣》所述之四人。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云：

昔吾先君桓公，后出自周，以车七乘，徒三十人，鼓其腹心，奋其股肱，以协于庸偶，掇胄掇甲，携戈盾以造勋。^⑤

根据此篇的记载，桓公后出自周，从者有三十人。《左传》昭公十六年载子产语：“昔吾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⑥是说桓公的东迁曾与商人同行。《左传》庄公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⑦，原繁盖出自周之原氏，原氏在春秋时期仍有原庄公、原襄公、原伯鲁等人为王朝卿士。在两周之际郑国东迁之时，原氏的一部分作为“周之遗老”随桓公东迁至郑，为郑国“典司宗祏”，便有了原繁这一支。

在郑桓公之后，《良臣》又历数了郑定公时期的良相，云：

郑定公之相有子皮，有子产，有子大叔。

子产之师：王子伯愿、肥仲、杜蕢、黥扈。

子产之辅：子羽、子刺、蔑明、卑登、富之廋、王子百。^⑧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子产及其师、辅。无独有偶，清华简的《子产》篇

①详见程浩：《从“逃死”到“扞艰”：新史料所见两周之际的郑国》，《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4期，第31-38页。

②徐元诰：《国语集解》，第31页。

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15页。

④周飞：《清华简〈良臣〉篇札记》，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2013年1月8日。

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第112页。

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80页。

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1页。

⑧《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58页。

也详细介绍了子产身边的贤良,其文云:

子产用尊老先生之俊,乃有桑丘仲文、杜鬻、肥仲、王子伯愿;乃设六辅:子羽、子刺、蔑明、卑登、伍之𡗗、王子百。^①

《子产》所记与《良臣》基本相同,仅有个别差异,为方便观览,兹列表如下:

	《良臣》	《子产》
子产之师 (老先生之俊)	王子伯愿	王子伯愿
	肥仲	肥仲
	杜鬻	杜鬻
	𡗗斤	桑丘仲文
子产之辅(六辅)	子羽	子羽
	子刺	子刺
	蔑明	蔑明
	卑登	卑登
	富之𡗗	伍之𡗗
	王子百	王子百

先来看“子产之师”,也就是“老先生之俊”:

“王子伯愿”,《良臣》与《子产》均有之,但文献却失载。郑国有王子氏,《左传》载有王子伯廖与王子伯骈,特别是王子伯骈略早于子产为政,有作为子产之师的条件。“骈”在真部,“愿”在元部,也存在通假的可能。

“𡗗斤”,整理者无说,周飞先生曾将第二字理解为“罕”的异体,并推测此人为子罕的儿子子展^②。在此基础上,袁金平先生又将第一字分析为从“斤”得声,读之为“浑罕”^③。将浑罕说成子产之师,大致是合适的,《左传》昭公四年载子产作丘赋,浑罕谏之曰“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④,俨然有师道。

《子产》中的“桑丘仲文”,为《良臣》所无。有学者认为其可以与《良臣》的“𡗗斤”对应,前者是“氏+字”,后者是“字+名”^⑤。但是无论从字形还是称名习惯来看,这种趋同都很难成立,这里的“桑丘仲文”,应该是不同于“𡗗斤”的另外一人。在这个人物名号中,“桑丘”乃以地为氏。罗小华先生指出此为《史记·

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第138页。

②周飞:《清华简〈良臣〉篇札记》,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2013年1月8日。

③见袁金平先生在简帛论坛“清华简三《良臣》札记”下的跟帖。

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36页。

⑤王宁:《清华简〈良臣〉〈子产〉中子产师、辅人名杂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2016年6月27日。

魏世家》所载“伐齐，至桑丘”之桑丘，并引张守节正义云其在易州遂城^①。然而此地距郑国十分遥远，似乎很难与子产建立联系。颇疑所谓“桑丘”，乃是《左传》习见的鲁地“乘丘”。文献中“桑丘”与“乘丘”经常混讹。如《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400年三晋伐楚“至乘丘而还”^②，《六国年表》以及《资治通鉴·周纪一》载同年魏、韩、赵伐楚则作“至桑丘”^③。又如阴阳家有“桑丘子”，今本《汉志》作“乘丘子”^④，亦因二字形近所致。

如果“桑丘仲文”确如我们所认为“乘丘仲文”，那他就是个鲁国人。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子产身为郑国公孙，为何要以鲁国人为师呢？在我们看来，“子产之师”中的鲁国人可能还不止一位。《良臣》篇的“杜嚮”，在《子产》中写作“杜𡗗”。楚简中以“嚮”或“𡗗”为声符的字，一般都可以读为“逝”或“噬”。如清华简《说命上》“一豕乃旋保以遁”，“遁”读“逝”；郭店简《老子》甲本“𡗗”字也用作“逝”；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命讼狱拘执释遘”，“遘”字读“折”；上博简《周易》“𡗗肤”，“𡗗”据今本则读“噬”。“逝”与“噬”是月部字，简文的“嚮”疑可读为同属月部的“泄”。“杜泄”见于《左传》昭公四年、五年，乃鲁叔孙氏宰，后为季孙氏所恶而去鲁，子产或曾在其出奔后问学于他。

至于“肥仲”，《左传》成公七年载有郑大夫共仲，活动时代略早于子产，有成为子产之师的可能。“共”盖其族氏，“肥”或为他的封邑，都可以作为称号的一部分冠在排行之前。就如庄公的弟弟叔段，初以封地号为“京城大叔”，后来奔卫后又可称之为“共叔段”。

较之“子产之师”，《良臣》与《子产》中“子产之辅”的身份则要清晰得多：

“子羽”，整理者指出即“行人子羽”，也就是“公孙挥”。文献中多有子羽辅佐子产治国理政的记载，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谿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⑤《论语·宪问》亦云：“为命，裨谿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

①罗小华：《试论清华简中的几个人名》，简帛网，2016年4月8日。

②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0页。

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23页。杨宽先生以为“乘丘”并非楚地，进而推测方城附近当有“桑丘”，为三晋伐楚所至（说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7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7页）。然而无论三晋所至为鲁地“乘丘”还是杨宽先生所说的楚地“桑丘”，皆是“桑”与“乘”讹混之例。

④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33页。

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15页。

之。”^①需要注意的是,郑国另有穆公之子子羽,但是其人要比子产长一辈,而且在鲁成公十三年被杀,因此不能为子产之辅。

“卑登”,即上引《左传》、《论语》之文中的“裨谌”。“蔑明”,一般认为就是“𦣻蔑”,或称“𦣻明”、“然明”。裨谌常为子产谋划国事并起草政令,然明亦深得子产赏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子产在晋程郑卒后召然明问对,然明的回答正中子产下怀,子产遂感叹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②四年后,然明与裨谌论郑国政局的走向,裨氏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③由是观之,此二人在政治立场上是紧密拥护子产的。

《良臣》篇的“富之𦣻”,在《子产》中写作“𦣻之𦣻”,二者仅是用字不同^④。所谓“富之𦣻”,整理者认为即是郑大夫富子。《左传》昭公十六年载富子谏杀大夫孔张,遭到子产怒斥。郑国的富氏大概源自于周,周襄王时期王室还有大夫富辰。富子的先祖,可能也是随郑桓公东迁的“周之遗老”之一。

“王子百”史书未载,与作为子产之师的“王子伯愿”同为王子氏,或许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子刺”同样不见于文献,王宁先生将其视作为子大叔游吉^⑤,是忽视了《良臣》的“郑定公之相”中已有“子大叔”。罗小华先生曾提出“子刺”或即公孫蚤,“刺”乃是“蚤”字的通假^⑥。公孫蚤其人虽然在人物行迹方面与子产有较多交叉,然而先秦人名中这种“名上冠子字”的用例实在太少,难以令人信服。

虽然在文献中难觅子刺之行踪,但我们还是在青铜器铭文中找到有关此人的只言片语。1988年在湖北襄樊团山 M1 出土了四件春秋晚期的带铭青铜器^⑦,其中两件鼎的铭文相同,拓本见图 1,宽式释文如下:

唯正六月吉日唯己,余郑庄公之孙,余刺之
疚子,吾作铸肆彝,以为父母,其徙于下都,曰:
呜呼哀哉,刺叔刺夫人,万世用之。



图 1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510 页。

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986 页。

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009 页。

④详见罗小华:《试论清华简中的几个人名》,简帛网,2016 年 4 月 8 日。

⑤王宁:《清华简六〈子产〉释文校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2016 年 7 月 4 日。

⑥罗小华:《清华简(壹—叁)所见人物名号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2015 年,第 131—133 页。

⑦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周墓》,《考古》1991 年第 9 期,第 797 页。

这组器的主人自称“郑庄公之孙”，根据三代以下皆可称孙的惯例，可知其为生活在春秋晚期的庄公裔孙^①。由于团山墓地属于楚墓，李学勤先生推测器主系郑人而仕于楚者，也是很有道理的^②。铭文又云“余刺之戠子”，“戠子”经胡长春先生读为“门子”^③，意即族之宗子。“刺”字一般认为是器主父亲的名字或谥，读为“厉”。而我们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氏，或应读“列”。所谓“余刺之戠子”，就是说器主乃刺氏（列氏）的宗子。春秋战国之际郑国有列御寇，时代略晚于器主，亦以“列”为氏^④。至于刺氏（列氏）的由来，或许就是子产之辅“子刺”的后人以祖字为氏。如果子刺确为铭文中刺氏的先祖，那他就应该与器主一样，也是郑庄公的后裔。

经过本文的考证，清华简中新见的郑国人物，大部分都可与传世史料的记载建立一定的关联。此中因缘，自是由于上述人等均是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人物；与此同时，也可以反映出清华简的材料来源和历史书写与传世史料并无本质性的差别。

【作者简介】程浩，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先秦史。

①中国国家博物馆新近入藏了一件封子楚簠，谢明文、黄锦前等先生认为“封子楚”或与团山 M1 器的器主有关（谢雨田：《封子楚簠小考》，复旦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2016 年 1 月 13 日；黄锦前：《郑人金文两种读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2016 年 1 月 13 日）。然封子楚自称“郑武公之孙”，彼为“郑庄公之孙”，按照古人追述祖先的习惯，应该分属不同的分支，不太可能是同一人。封子楚簠的器主“封子楚”，我们认为可能是《系年》最后一章的郑国将军“子封子”，说详见另文《封子楚簠与〈系年〉中的“子封子”》。

②李学勤：《郑人金文两种对读》，《青铜器入门》，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131 页。冯峰先生撰文指出团山 M1 的墓主为刺叔刺夫人，墓中出土的鼎、缶为其子所作葬器（冯峰：《郑庄公之孙器新析——兼谈襄阳团山 M1 的墓主》，《江汉考古》2014 年第 3 期，第 72-75 页）。因此本文将墓主与器主区分开来，但称“郑庄公之孙器的器主”。

③胡长春：《金文考释二则》，张光裕、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75-277 页。

④上引王宁先生《清华简〈良臣〉〈子产〉中子产师、辅人名杂识》一文，已将列御寇与“子刺”联系起来，惜未深究。